

新经济、就业机制变化与中国对策

——关于美国低失业率现象的一个理论

王 诚

【摘要】 新经济中的 IT 企业,以其独特的脑力劳动型企业所具有的独立性、扩展性和渗透性,既创造出 IT 行业的充分就业,又拉动各个 IT 相关产业的就业迅速增长。在整个就业结构调整基本上完成以后,IT 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将是失业率的连续下降和低位运行。中国的应对策略为: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上的静态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国际分工;加大科技投入和发展具有科技超前性产业,以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解除科技发明、企业创新、市场完善、社会文明等方面发展的制度“瓶颈”。

【作者】 王 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经济现实和理论现状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高增长、优分配、低通胀、低失业的新经济现象。如果计算到 2001 年 3 月,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经济持续繁荣期。在这 10 年中,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3%~4% 左右;通货膨胀率在 4% 以下;失业率平均水平为 5.5% 左右,低于一般认为 6% 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在失业率方面,与以往历史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下,失业率从 1992 年达到这些年来的最高值以后,一直持续走低,8 年来每年以 0.2~0.8 个百分点不等的规模下降。直至达到 2000 年上半年的 3.9%。与失业率下降相对应的是自 1993 年初至 1999 年底美国经济新创造的 2 200 万个新就业机会,占 1999 年就业人数的 16.7% 左右。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报告,全美贫困率下降到 20 年来的最低点,四口之家年收入在 17 029 美元(人均约 4 257 美元)以下的贫困家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到 11.8%。1993~1999 年美国 5 个分位的家庭收入都有所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最低 20% 的收入群体,提高幅度达 16.3%(以上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国际统计年鉴(1998)》;OECD,1992;《美国总统全国演说》,2000;《美国总统经济事务报告》,2000;水野隆德,2000)。

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新创造的工作,美国经济的低失业率是不可能的,美国也会像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处于 10% 以上的失业率水平。新创造的工作还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和较贫困家庭收入的显著提高。那么,美国经济中的这些新工作或低失业率是怎么形成的呢?

按照对于市场经济的传统研究,高增长和低通胀、低失业或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胀的新经济现象是难以解释的,如果加上“收入分配改善”的现象就更加难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认为,达到充分就业以前的经济增长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必然伴随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达到充分就业(即 90 年代美国学者估计的 6% 自然失业率)以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能降低失业率,需求扩大只会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限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会缩小总需求,在充分就业点以后会造成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就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涵义。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由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的存在,自然失业率或者在适应性短期和政策性短期与通货膨胀率有此消彼长的替换关系,或者固定不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在不良政策作用下,可能同时上升(即滞胀),但绝不会同时下降。特别是失业率,通常不会下降到自然失业率水平以下。如果

出现了失业率明显低于自然失业率,那一定会伴随着迅速上升的通货膨胀。

从现行西方就业理论来看,失业率降低而形成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压力,会产生于以下几个经济运行的环节之中。一是工资水平因最低工资政策和效率工资等原因,一般居于市场均衡工资水平以上,企业不可能通过降低工资成本来扩大就业量。如果就业量扩大,就意味着制度性工资成本上升和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二是除了自然垄断企业外,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在达到一定生产规模以后必然上升。因此,企业过大地扩大生产和就业规模,不仅不能降低非工资成本以弥补工资成本的上升,还会进一步促进总成本和物价的上升。三是在工资收入达到小康水平以后,获得较高工资的工作者往往比低工资工作者愿意提供较少的劳动,因此,在工资水平和工资成本大为提高的西方企业中,由于劳动者更多挑选工作所造成的失业率或自然失业率呈上升趋势。这样,如果政策人为压低自然失业率,只会使得通货膨胀不断扩大。四是如果就业率由于市场总需求的扩大而上升,由此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下降,那么,在市场短期供给不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会明显上升。五是对于那些在其他产业技术升级后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产品市场的国际化会导致市场价格水平的持续走低,但是,这种物价下降通常伴随着国内失业率的上升。这时实施刺激总需求和提高就业率的政策,就会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

显然,以上这些存在于生产、市场、社会、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因素或障碍,只会使得经济增长在没有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条件下,失业率维持不变或上升,而不会允许出现失业率下降的现象。由此,笔者想到一个新思路:在没有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背景下出现的失业率持续下降,是否意味着某种不同于现行就业理论所描述的新的就业机制的形成。

二、新就业机制假说及检验

在市场经济中,就业或失业的状况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的力量所决定的。劳动力的需求力量来自于企业的运行状况。劳动力的供给力量来自于工作者的行为抉择。因此,新就业机制的形成或原就业机制的改变,是出自于企业和雇员这两方面。

(一) 在新经济中 IT 企业运行及其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特点

在美国目前的新经济结构中,所有企业可以划分为三类:以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信息通讯技术开发和生产为主体的 IT 企业;大量应用 IT 产品和服务而能够直接受到 IT 产业的积极影响并且由此获得长足发展的 IT 相关企业;较少应用 IT 产品或与 IT 技术产品相互替代而在国内市场和资源环境中不再具有比较生产优势的传统企业。

IT 企业的出现,代表了企业生产活动中的一种新的分工。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主要体现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领域。工业化社会中的技术开发活动等生产性脑力劳动或者仍然依靠公共支出的支持,或者与生产企业的一般产品生产活动结合在一起,而不能独立地面对市场。那么,新经济中脑力劳动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是大规模地独立于政府和一般企业,而直接面对市场对其劳动成果的评价或定价,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积累。因此,脑力劳动型企业的产生,是新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其实,新的脑力劳动的独立分工,并不仅限于 IT 产业。现代经济中的各种商业性咨询业、经济中介机构、文化教育等行业的独立经营者都是脑力劳动独立分工的体现。然而,IT 企业的特殊性在于 IT 分工的产生将整个社会经济拉入一个信息经济时代,并且其自身也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成为新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IT 产品在推动社会经济以新的高效率向前发展的同时,又大量地吸收和集中社会投资、高层次劳动力、企业创新能力、市场购买力和社会财富。IT 产业的独立性、渗透性和扩展性,使得市场经济不得不承认脑力劳动所具有的重要的分工地位。与独立的脑力劳动分工地位受到肯定相适应的新观念是知识产权的规则越来越得到社会广泛的接受和认同。

IT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特点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在生产方面,IT企业由于前期研发投入的水平高,后期的产品生产边际成本(软硬件载体的成本和使用者增加引起的成本)极其低下,所以,企业一旦在市场上立足,其投入要素的生产性会持续上升,产品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处于递减状态。因此,该企业的生产几乎处于没有成本边界约束的状态。IT企业依据信息技术的特点,为自己创造出了一种“自然垄断”状态。在市场需求方面,IT企业由于软硬件开发和信息网络建立的早期投入成本非常巨大,如果把这些成本摊入初期销售的产品,这些产品就因其价格昂贵而几乎没有市场。因此,IT企业在市场的早期开发上,是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在IT企业发展的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上,企业在财务核算上是亏本的。这时企业实行的是亏本经营策略。但是,由于企业的边际成本的持续下降,IT产品的销售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边际收益就会达到边际成本的水平。一旦生产规模超过了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相交点,每件增加的产品的收益就会超过成本。所以,边际产品就可以进入盈利状态。企业的生产规模再进一步扩大以后,企业的盈利就会弥补初期的亏损。从此,企业就可以进入大规模净盈利时期。这时,企业就会实行稳步持续降低价格的扩张经营策略。除非遇到社会或政府的反垄断控诉,或者企业内部矛盾的阻碍,IT企业的这种大规模净盈利扩张时期几乎没有尽头和边界的。

当然,由于IT企业所具有的“自然垄断”特征,IT行业中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成功的。相反,最后成功的IT企业只能是极少数。就是说,IT产业具有极高的集中率,最后仅有少数几家最大规模的企业提供全社会的IT产品和服务。由于IT企业所具有的这种高集中率特征,IT产业发展的直接就业效应可能就不如其产出效应。IT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大量的企业并购和重组,并购后成立的新企业所包容的就业量往往来自于原来的较小企业,并且,新企业的就业量往往还会小于并购前的几家企业原有就业量之和。因此,在IT产业中经常发生的现象是,IT产品和产值迅速增长了,但从事IT行业的就业总量并没出现同步增长的现象。

表1 美国IT产业对价格、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

年份	IT产业 增长	IT产业 价格	其余 价格	GDP 价格	GDP 增长	IT产值/ GDP	IT增长对 总增长的贡献	IT企业就业/ 所有私企就业	IT价格对降价的 直接贡献
1990	—	—	—	—	—	5.8	—	4.5	—
1991	3.59	—	—	—	3.15	5.8	6.6	4.5	—
1992	7.59	—	—	—	4.96	5.9	8.8	4.4	—
1993	7.87	-2.4	3.0	2.6	4.93	6.1	9.5	4.4	-0.15
1994	9.95	-2.6	2.7	2.4	6.56	6.3	9.2	4.4	-0.16
1995	10.68	-4.9	2.8	2.3	5.25	6.6	12.8	4.5	-0.32
1996	12.56	-7.0	2.6	1.9	5.45	7.1	15.3	4.5	-0.50
1997	9.78	-7.5	2.6	1.9	6.15	7.3	11.2	4.7	-0.55
1998	11.22	—	—	—	4.50	7.8	18.2	—	—
1999	9.86	—	—	—	4.00	8.2	19.2	—	—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II)》(1999)和笔者的计算。

从表1可见,IT产业对于通货膨胀率降低的贡献,从1993年的-0.15个百分点扩大到1997年-0.55个百分点。如果没有IT产业的这种贡献,以GDP减缩指数表示的一般价格水平将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即GDP价格不会从2.6%下降到1.9%,而会从2.75%发展到2.45%。当然,这里只能显示IT产业产品价格的直接贡献。如果考虑到间接导致的使用IT产品的下游产业价格的降低,那么,国民经济中非IT产业的价格从3.0%下降到2.6%,也包含了IT价格的贡献。

从表1还可以看到IT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即从1991年的6.6%扩大到1999年的

19.2%，达到近1/5的规模。尽管这一贡献值还不算很大，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其发展速度扩大了近3倍。如果这种速度能够保持不变的话，再过10年IT产业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将会超过50%。

从1990~1997年美国就业比重基本维持在4.5%的水平可以看出，IT产业对于社会总就业的直接贡献，并没有随着IT产业自身的增长率的上升和它在GDP所占比重的上升而同步上升。IT产业总的就业水平相当稳定，年平均就业增长率为2.4%左右。不过，从IT产业内部的就业结构来看，表现为计算机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明显提高，从1990年的17.78%上升到1997年的29.79%。通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从31.11%改变到29.79%。通讯设备业和计算机硬件生产业业的就业比重则明显下降，分别从1990年的11.11%和40%，下降到1997年的6.38%和34.0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表1中倒数第二列的数据所反映的仅仅是IT产业本身的就业量占私营经济总就业的比重，代表其对总就业的直接贡献。然而，IT产业的就业影响，主要反映在它的间接贡献上。

结合上述关于IT产业的企业在生产成本方面和市场需求方面的特征，我们不难建立一种描述IT企业运行机制和行为方式的模型（见图1、图2）。

对比图1和图2，可见IT性质企业与一般垄断竞争企业相比有这样一些特殊性：(1)IT企业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虽然也是处于下降状态，但下降的速度要比垄断竞争的企业慢很多。(2)IT企业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持续下降，而不像垄断竞争企业那样在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后出现上升。(3)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垄断竞争企业将其产量确定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相等之点 Q_1 ；但是，对于IT企业，生产中可能获得利润是在超过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相等之点以后才开始，因此，企业的最大产量不可能停留在该点。(4)IT企业的平均成本的起点很高，因此，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扩大而下降的空间很大，企业可以有能力主动调低产品的市场售价以不断扩大市场规模。而一般企业的平均成本下行空间有限，销售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利润消失和亏本。(5)IT企业开始盈利后，只要还存在需求价格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距，企业规模就会不断扩大，直至碰到外在的社会反垄断的约束（如关于微软的反垄断案）和内在的管理水平的约束（如王安计算机公司的破产案）。

IT企业在其产品的市场需求特征和生产成本特征的基础上，对于劳动力或工作者的需求表现为对高学历、高质量的科技人员的需求。由于企业早期研发投入的亏本经营策略和预期的巨大利润，IT企业对于工资成本的高低并不敏感。由于研发工作的相对稳定和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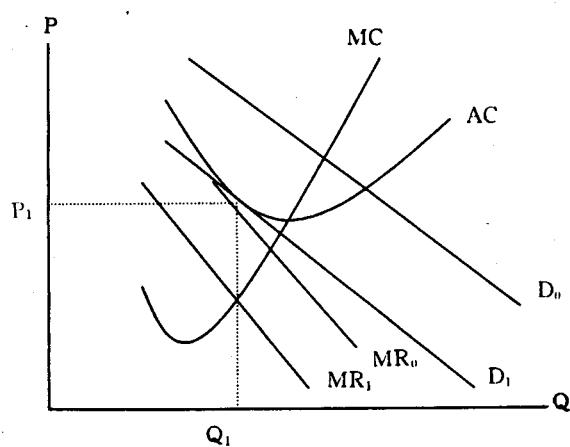


图1 垄断竞争企业市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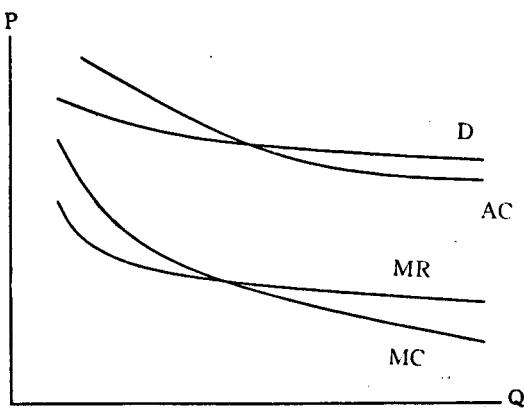


图2 IT企业市场模型

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规模并不大,且不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明显扩大。在 IT 企业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由于教育结构的滞后和长时期学习的需要,IT 高科技人员的供给量相对偏少,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IT 人员要求的工资水平往往较高。不过,由于高水平教育的职业敬业精神效应和高水平工资的“效率工资”效应,IT 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努力的付出通常是充分的。这样,IT 企业所面对的劳动力市场就表现为高工资、充分就业的一般状态(见图 3)。

在图 3 中, L_d 代表 IT 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 L_s 代表 IT 人员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了 IT 人员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就业量(L_0)和均衡工资水平(W_0)。由于 IT 人员的相对缺乏,均衡就业量几乎已经达到 IT 人员所能供给的最大劳动量。由于 IT 人员对于工资水平比较敏感,均衡工资达到了社会工资的较高水平。不过,由于研发工作的相对稳定性和生产过程的高度自动化,IT 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规模也并不大。

(二) IT 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运行及其就业的特点

在美国经济的分类中,IT 产业和 IT 相关产业之间有明确的界线。IT 相关产业是指大量应用 IT 产品和服务,并由此获得较强的比较优势的行业。运用 IT 技术改造本产业而获得比较优势和产业扩展,是衡量一个产业是否为 IT 相关产业的标准。传统产业是指国民经济中离 IT 产品的生产和应用比较远,在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竞争中逐渐失去生产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如采矿业、铁路运输业、大多数制造业等)。

90 年代,美国 IT 产业、IT 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在全部非农业私人经济中的平均比重大约为:8%、40%~48% 和 44%~52%。由于运用信息技术的差异,IT 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在生产率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从生产率的绝对水平来看,1997 年以人均净值衡量的劳动生产率,IT 相关产业的产品生产为 99 717 美元,而传统产业的产品生产则为 59 352 美元。二者相差 40 365 美元,为传统产业生产率的 68%。从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来看,IT 相关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 1990 年的 84 680 美元增长到 1997 年的 99 717 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2.4%。传统产业则从 54 065 美元增长到 59 352 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1.3%。IT 相关产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传统产业几乎达到 1 倍。

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另一方面力量是市场的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根据经济学原理,消费是储蓄的反面。收入减去储蓄就是消费。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与 GDP 相比)从 7% 左右下降到 3% 左右,企业储蓄率从 4% 左右下降到 2% 左右,政府的储蓄率则从零下降到 -2% 左右。1980~1996 年,美国的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 80%~85% 的高水平,比其他国家高出 5~15 个百分点,并且有上升的趋势(刘洪,1998)。美国社会的高消费能力构成了对于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的巨大吸引力。如果国内的产品更具竞争力,这种高消费能力就推动国内生产的增长和发展;否则,就会推动其他国家生产的增长和发展。由于生产美国总产出 90% 以上的产业可以划分为 IT 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IT 相关产业具有相对较高的国际竞争力,而传统产业不具有这种竞争力,因此,美国市场上的巨大需求主要推动 IT 相关产业及其就业的发展,以及推动其他国家有竞争力的传统性产业发展。以下分别描述出 IT 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市场状况(见图 4)。

图 4 中的两个产业所面临的市场有明显的差异。当国内需求由于低储蓄效应而在两个市场上都迅速扩大时(从 D 增长到 D'),市场上分别出现新的均衡点 f 和 a。在 IT 相关产业(A)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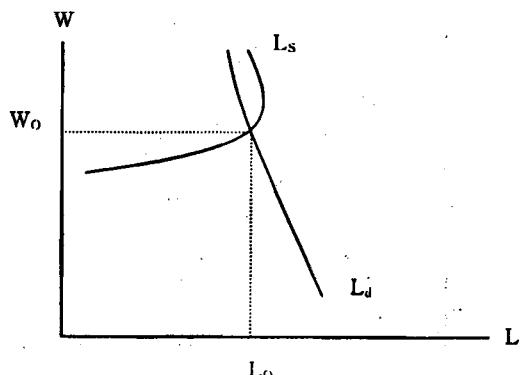


图 3 IT 人员劳动力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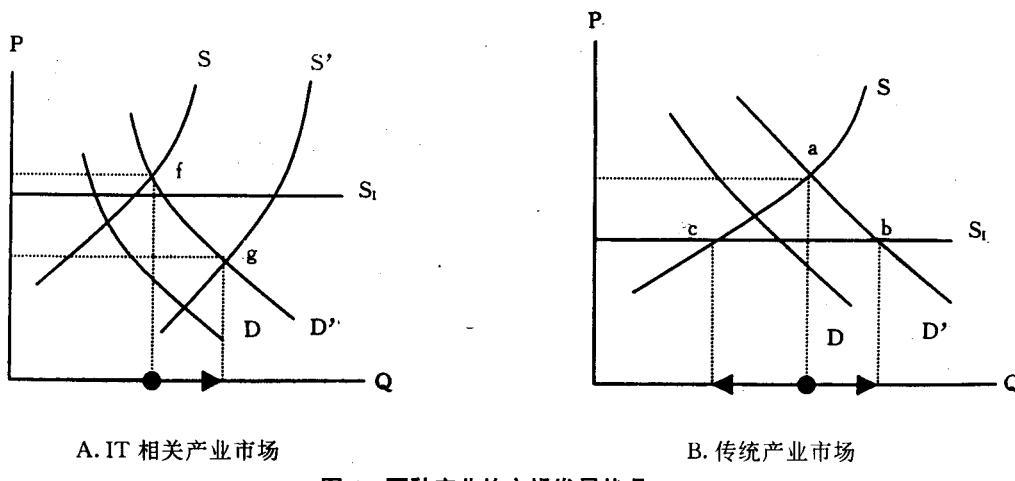


图4 两种产业的市场发展状况

由于运用新兴的信息技术,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生产供给迅速扩张(从 S 扩大到 S'),形成新的均衡点 g 。在该点上,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以前有明显下降,其原因是国内供给扩大造成的均衡交易量的增长。所以,尽管 IT 相关产业中也存在国际供给(S_I)的竞争,但是,国内供给的竞争力更强,可以抵制国际供给的冲击。在传统产业的市场(B)上,由于国内部门没有能够采用新技术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国际产品的价格低于国内产品的价格,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新需求的扩大没有给国内生产的发展带来机会,国内供给的水平几乎不变(S)。另外,新需求与国际供给(S_I)形成新的均衡点 b 。在该点上,形成传统产业产品的均衡价格水平。这一价格在维持传统产业产品的低价位的同时,也压低了国内的供给水平(国内供给从 a 点萎缩到 c 点),使得国内传统产业不得不进行收缩性调整。由此,形成 IT 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对于劳动力需求的不同特征(见图 5)。

图 5 反映的情况是,随着 IT 相关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萎缩,IT 相关产业(A)中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从 L_d 扩大到 L_d' ;相反,传统产业(B)的劳动力需求就不断缩小,从 L_d 缩小到 L_d' 。

从有关机构公布的数据来看,美国的就业结构在 1990~1997 年期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产业的就业量逐步下降,而 IT 相关产业的就业量稳步上升(见表 2)。

表 2 虽然没有包括全部的 IT 相关产业和传统产业,但其中主要的产业部门都已经包括在内。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在 IT 相关产业中,高技术的采用本来具有提高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排斥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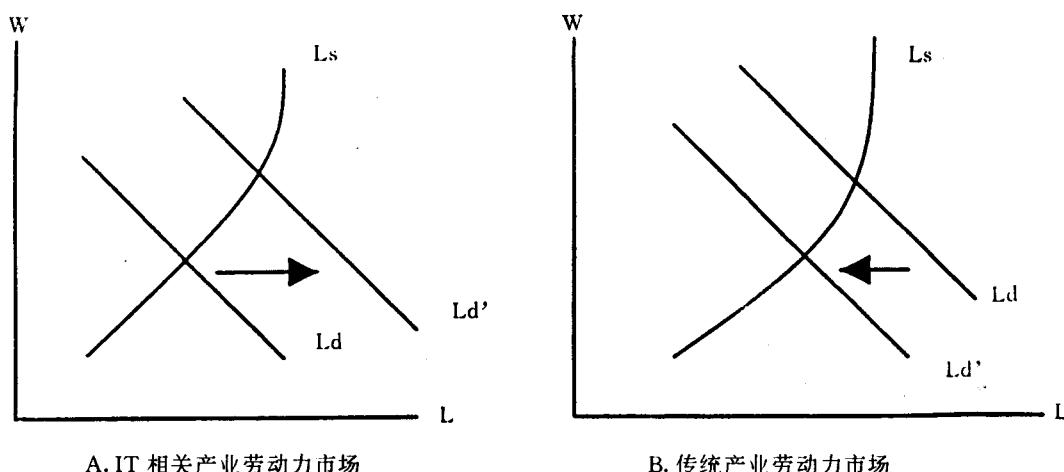


图5 两种产业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表 2 两种产业的就业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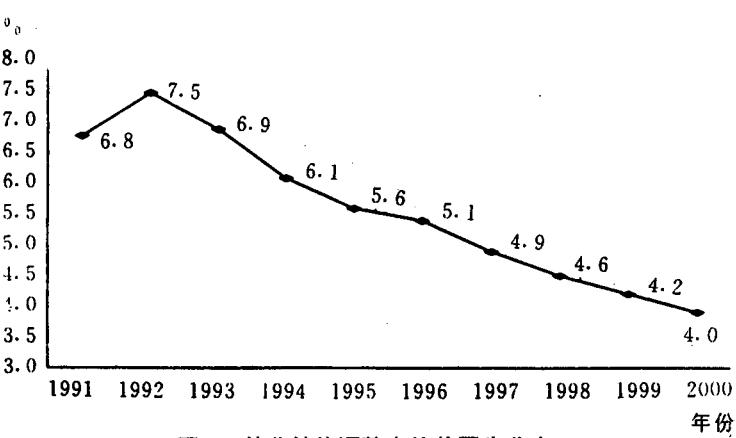
产 业	1990	1992	1994	1996	1997	年平均增长率(%)
IT 相关产业						
投资金融业	593.5	624.5	717.1	731.9	789	3.9
经纪人行业	424.2	440.1	515.5	553	596.8	4.2
保险代理业	663.3	656.6	683.6	708.6	724.4	1.3
保险业	1 462.2	1 495.6	1 551.9	1 517.1	1 535.4	0.8
房地产业	1 315.0	1 290.0	1 361.0	1 382.0	1 419.0	1.1
商业服务业	4 367.4	4 479.8	5 322.1	6 065.3	6 572.1	5.8
动画制作业	407.7	400.9	441.2	524.7	548.1	4.9
医疗服务业	7 814.3	8 490.0	8 991.9	9 477.9	9 719.5	3.4
法律服务业	907.7	913.5	924	927.5	947.3	0.9
建筑业	5 120.0	4 492.0	4 986.0	5 418.0	5 686.0	0.8
批发贸易业	5 863.2	5 705.4	5 876.5	6 161.3	6 302.6	0.9
传统产业						
采矿业	709	635	601	580	592	-2.4
制造业	19 076.0	18 104.0	18 321.0	18 495.0	18 657.0	-0.3
化学用品业	1 086.1	1 084.1	1 057.0	1 033.8	1 033.8	-0.5
仪器仪表业	818.3	763.3	701	685.3	691.9	-2.3
公用事业	957.1	954	928.3	883.7	865.9	-1.0
铁路运输业	278.6	254.3	240.5	230.9	226.9	-3.1
储蓄金融业	2 250.5	2 095.7	2 065.7	2 018.6	2 027.0	-1.4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1999；国际劳工局，1998；笔者的计算。

动力的效应。但是，由于 IT 相关产业的规模扩大，又会产生吸收更大份额的社会劳动力的效应。从两种效应相抵后的净就业效应来看，IT 相关产业的就业是不断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第二，IT 产业的就业量不断扩大，而传统产业的就业量具有下降的趋势，这是一种就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如果在传统产业中释放出的富余人员能够逐渐在 IT 相关产业中找到自己的工作，那么，由于就业结构调整所造成的较高失业率就会降低。

从美国经济近 10 年的发展状况来看，就业调整最困难的时期是在 90 年代的头几年，特别是 1991~1993 年。此后，就业调整的步伐加快，失业率保持持续下降的势头。到目前为止，就业结构的调整已经基本结束，美国失业率达到 30 年来最低水平（见图 6）。

图 6 就业结构调整中的美国失业率



三、美国新经济的启示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以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胀率为特征的美国新经济首先是一种高科技的经济。有的观点认为，形成新经济的科技基础并不仅仅是信息技术，还应当包括其他的新兴科技，如生物遗传技术、以纳米技术为核心的的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管理科技等。笔者认为，我们虽然应该承认这些科技发展在相关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它们在今后发展中的巨大经济潜力，但是从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现实来看，能够比较全面和深入影响整个经济发展进程的，恐怕只有信息科技，即包括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等方面在内的 IT 产业。至少，从美国近十来年的经济变化看，能够找到的联系最为密切的科技根源，也只有信息技术。

此外,美国的新经济还是一种开放经济。可以认为,美国经济由于向全世界开放,一方面吸收了全世界的关键人才,使得美国处于一种比较合理的科技导向型的就业结构,美国并没有因为科技人才不足的“瓶颈”制约而放慢IT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吸收了全世界的大部分资本,使得美国大量的高风险的民间科技投资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同时大量的资本流入也长时期抬高了美国的股市尤其是高科技板块;再一方面吸收了全世界的商品流,大量的商品净流入弥补了传统产业产品的不足,压低了美国高消费所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的势头。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即使是对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对外开放并不总是意味着只是获得好处。面对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形成的新的比较优势,新的竞争总是在进行。美国的传统产业在90年代的国际竞争面前也陷入产业萎缩和就业滑坡的尴尬境地。面对开放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竞争,关键是需要调整本国的经济。只有积极地有意识地进行调整,并且调整成功,对外开放带来的收益才会超过成本,才会带来社会的全面发展。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和高就业以及最低收入人口状况改善的同时出现,就是调整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

面对美国出现的新经济现象,中国应当做些什么呢?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美国的新经济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泡沫经济。既然泡沫经济早晚会因为破灭而化为乌有,中国毋须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另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美国新经济的繁荣是依靠剥削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成果而产生的,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于新经济就需要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笔者认为,极端的观点和态度有助于发泄某种情绪和揭露某种事物的消极面,但无助于自己的全面、健康地发展和成长。尽管当今世界仍然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依归的,但是市场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对西方国家出现的新经济现象,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争人才、争资金、争财富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推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提高的积极影响。为此,我们的原则应当是,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通过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来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利益,避免受到较大的损害。另一方面,要主动地调整我们的体制和制度结构、经济结构和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结构,以适应全球化市场竞争的需要,并且在此基础上尽快培养起中国的竞争力。总的来说,中国面对新经济的应对策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利用静态比较优势,积极争取和参与国际分工,以充分利用中国现有的资源条件,维持目前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升级积累财富基础。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不在科技水平上,也不在资本积累上,甚至不在自然资源的储量上,而是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的劳动力虽然在总体教育水平上还不够高,但在识字率上已经达到了现代化所要求的占成年人口80%以上的标准。不仅如此,中国的劳动力还有数量多、成本低、能吃苦、适应性强的特点。这样,中国的劳动力在整体上就具有在劳动密集型生产行业和建设项目上的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全面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及其产品市场份额方面,一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优势。当然,由于依然存在着关税壁垒和其他贸易保护政策,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并不是完全的。但是即便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强烈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传统产业领域的竞争压力。这些压力在不久前部分表现为美国工会组织强烈抵制给予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地位,以及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在欧洲遭遇不合理的反倾销抵制。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做的不是“以牙还牙”——完全抵制外国的产品;而是要推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让中国的相对优势产品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同时,中国要尽快改革国际劳务输出的体制,加快中国的工程承包和其他劳务输出的步伐,改变中国目前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但仅占国际劳务输出比例的2%的严重滞后局面。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就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多的比较优势。一方面能够逐步占领西方在新经济中相对衰落的产业所退出来的市场,为中国的资源创造财富开辟

更为广泛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帮助解决了中国所面临的富余人员过多和失业率高的问题。

第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加大经济中的科技投入和促进具有科技超前性的产业开发，养精蓄锐，培养出未来的世界领先技术和龙头产业，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在未来实现质的飞跃。有观点认为，中国既然具有人口多的比较优势，在发展战略上就应将重点放在劳动密集型的民间中小企业和低技术的商业服务业上，等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利用完了，再考虑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种观点，其实是落入了“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陷阱。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要着眼于现实条件，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也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由于技术积累、知识积累、资本积累等方面产生的效应，如果一个落后国家不进行超前性的科技开发和产业开发，就会永远落在先进国家的后面，并且可能越落越远。这就是“起飞型”经济发展理论所告诉过我们的故事。然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告诉我们另一种故事，那就是不安于自己的落后地位，积极创造出动态比较优势，最后以某些方面领先于原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先进科技产品打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使自己跻身于附加值最高的世界产业领域，实现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积极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努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中国经过 20 余年来的发展，已经基本摆脱了贫穷的状况。目前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也仅剩下最后的 3 000 余万（其中处于不适于生存地区的人口约占一半）。按照世界银行高、中、低收入国家的标准，中国已经相当于或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线水平。当中国的温饱问题愈来愈多地得到解决以后，一些地方并没有将新增加的收入用于提高科技水平，而是大量用于经济效益不大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但是，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依然很低。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的研发开支占 GDP 的比重，1997 年为 0.5%，1999 年上升到 0.83%。这种发展的势头固然可喜，但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因为，50~60 年代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年均研发开支比重就达 0.9%。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在 70 年代中期以前就达到 2.2%。如果不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想创造出动态的比较优势是不可能的。

其二，积极推动中国的 IT 产业发展。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到，IT 产业的发展不仅为 IT 产业本身带来巨大的附加值，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国民经济中一系列相关产业的生产和就业的发展与扩大。尽管中国的 IT 产业起步较晚，许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里，但是，中国对此还是需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用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和提高社会生活效率。在就业方面，利用 IT 产品和服务可以降低寻找工作的成本，减少失业与空位的矛盾，缩小市场就业者之间在体制性特征上的差异，促进家庭办公化的分工发展，促使人们的教育水平和信息获得水平的接近等。因此，IT 产业的发展可以大大改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促进中国劳动力的有效利用。这样，就有利于开发全民的智力，利用中国人的智力优势形成超前科技和产业。

其三，切实大力推进中国的教育发展。从较落后国家中的“后起之秀”情况来看，大幅度地提高全民的教育素质，总是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行政策，中国也并不是不重视教育。的确，在教育上中国也取得了基础教育方面的识字率普遍提高和高等教育方面的人才流动和科技队伍形成的成就。但是，为了创造出中国的动态比较优势，中国在教育上必须转变原有的观念和方法，实行在人才培养目标（以公民为本）、教育体制（以灵活性为本）、教育内容（以新为本）、教育方式（以主动性为本）、基础教育发展资金（以中央财政为本）等方面的全面的教育创新。

第三，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了中国的科技发明、企业创新、市场完善、社会文明和国际竞争力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尽快解除制度上的“瓶颈”。无论是在过去 20 年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中，还是在目前轰轰烈烈开展的西部大开发中，中国人已经看到太多的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制度“瓶颈”。每当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取得一点进步，中国的区域性或全局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前进一大步。反之，即使人们在突破技术障碍、资金困难、人才不足、资源匮乏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也往

往将经济发展的机会葬送在制度或体制的缺陷上。

科技的大发展是需要适宜的制度平台的，无论是中国过去的经验还是美国当前的新经济现象都说明了这一点。可行的制度是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抽象的。为了保证中国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而不至于被甩在后面太远；也为了有可能到来的中国科技和产业腾飞的那一天，中国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一是完成政府功能及其体制的基本定位。在市场经济中，相对于民间经济活动而言的政府，必须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政府体制改革必须考虑“三权”之间的关系，而不能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改革，或者分开考虑各方面的改革。当前中国的政府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政府改革的呼声很高而实际进展不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在政府改革中采取了“分离性改革”的思路，而没有将政企分开等涉及政府的改革与“三权”的全面改革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政府体制改革中，必须同时对政府或国家的立法功能、执法功能和司法功能进行新的定位，并且依次重新调整政府的机构设置，这样才能纠正政府和经济发展之间经常“打架”的现象。二是完善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包括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市场，而且包括各类的生产要素市场。虽然建立生产要素市场是比建立一般商品市场更为复杂的工作，所面对的市场风险也可能更大，但是，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市场，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功能也就难以充分发挥，因而中国经济的效率也难以迅速提高。中国目前亟需做的是完善资本市场、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信息市场，建立民间的资金市场和技术市场，放开政府过度垄断经营的某些产品和服务市场。三是完善中国的用人制度。现代经济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这种经济的力量首先是人才的力量。为了增加优秀人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培养人才是一条重要途径。但是，如果用人制度不当，培养的人才也有可能流失。反之，如果善于用人，即便一时培养人才不足，众多人才也会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一般而言，从事科技开发和管理的人员具有自己明确的精神追求，因此需要得到尊重和理解；这些人员希望过一种稳定和像样的生活，因此要求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这些人员往往希望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因此要求得到顺利工作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组织条件。所以，如果中国的用人制度能够在以上几个基本方面完善化，那么必将会有很多的人才来到或回到中国来做出自己的贡献。美国的新经济在这方面告诉我们的信息是，这些科学技术人员所创造的价值一定会超过他们所得到的回报。

参考文献：

1. 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动统计年鉴》，国际劳工组织，1998 年。
2. 康曼德：《企业重组与失业转型》（中译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年。
3. 刘洪：《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年。
4. 《美国总统全国演说》，2000 年 8 月 5 日。
5. 《美国总统经济事务报告》，2000 年 9 月 26 日。
6. 美国商务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I)》，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7. 美国商务部：《浮现中的数字经济(II)》，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8.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
9. 水野隆德：《美国经济为什么持续强劲》，华夏出版社，2000 年。
10. 王怀宁：《经济信息化的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11. 夏皮罗等：《信息规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2. 杨培芳：《网络协同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3. OECD, 1992; National Accounts.

（本文责任编辑：朱犁）